

## 宋使節在不同時間和季節使遼的原因與影響

蔣武雄\*

### 摘要

宋遼兩國建立起長期的和平外交關係之後，經常互相派遣使節進行交聘的活動，如以宋國來說，其中正旦使、生辰使的使遼時間與季節，往往是比較固定在冬季的月份。但是約有四個原因，一是遼承天太后生辰未改期受賀；二是遼帝后死亡與新君登位；三是宋帝死亡與新君登位；四是宋派遣泛使，會造成宋使節有可能在春、夏、秋、冬四季的任何月份使遼。而其所造成的影響，如僅就宋使節來說，則會導致他們晉見遼皇帝的地點、往返的行程路線，以及在遼境中的所見、所聞、所感均不相同。

關鍵詞：宋、遼、外交、使節、交聘

---

\* 東吳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 **The Reasons and Impact of the Timings and Seasons of the Song State's Envoys to the Liao State**

Chiang, Wu-hsiung\*

### **Abstract**

After the two states of the Song and the Liao established the long term peaceful diplomatic relations, they sent envoys to each other to engage in exchange activities. As to the Song state, the timing and season for the envoys to the Liao state, the *Zhengdanshi* and the *Shengchenshi*, were often relatively fixed in the dry, winter months.

But there were four reasons for the Song's envoys to the Liao country possibly in any month of the four seasons. Firstly, there was no alteration of the celebration date for the birthday of the Liao's Empress Dowager Chengtian. Secondly, there was the death of the Liao's emperor and empress, and the ascendancy of the new emperor to the throne. Thirdly, there was the death of the Song's emperor and the ascendancy of the new emperor to the throne. Fourthly, the Song dispatched the *Fanshi*.

Impact was accordingly made. For instance, simply for the Song's envoys, it would decide them where to pay visit to the Liao's emperor, the route of the return journey, as well as being completely different in what would be seen, heard, and felt within the Liao territories.

**Keywords:** Song, Liao, Diplomacy, Envoys, Engaging in Exchange Activities

---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Soochow University

## 壹、前言

筆者多年來研究宋遼外交與交聘活動，在最近發現一項頗值得加以深入探討的論題，即是宋使節所負任務的不同，會導致宋使節使遼的時間與季節各不相同。並且因為遼皇帝春、夏、秋、冬四季捺鉢駐帳地的遷移，又會造成宋使節晉見遼皇帝的地點、使遼的行程路線，以及在遼境的所見、所聞、所感均有可能彼此不同。

當筆者發現這一項論題之後，又進一步思考有哪些原因，會造成宋使節在冬天以外的時間與季節使遼呢？因為在宋遼長達一百多年的和平交往當中，大部分的宋使節是擔任每年祝賀遼朝元旦的正旦使，以及每年祝賀遼帝后生日的生辰使，因此他們使遼的往返時間與季節，往往是在每年冬季十月至翌年一月之間，但是除此之外，有哪些原因會造成宋使節必須在春、夏、秋的季節與月份使遼呢？

筆者認為以上一連串的問題，在宋遼每一次交聘活動的過程中，其實是相當重要的。因為從宋臣被派任不同的使遼任務開始，即會造成宋使節使遼的時間季節、行程路線、晉見遼帝地點，以及在遼境所見、所聞、所感的不同，因此是一項很值得探討的史實。而且據筆者所知，也似乎尚未有學者撰寫專文，討論此一方面的史實，因此筆者遂以〈宋使節在不同時間季節使遼的原因與影響〉為題，撰寫成本文。

## 貳、宋使節在不同時間、季節使遼的原因

宋與遼的和平外交，可分為兩個時期，一是在宋太祖（927-976）、宋太宗（939-997）時期，雙方曾經有約六年的短暫和平交往，後來因宋太宗滅北漢後，又繼續攻打遼南京（幽州、燕京），造成兩國和平外交關係中斷。<sup>1</sup> 直至宋真宗（968-1022）

---

<sup>1</sup> 可參閱王曉波，〈宋太祖時期宋遼關係的變化〉，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四川大學宋代研究所資料中心編，《宋代文化研究》（成都：巴蜀書社，1998），頁 222-237；李裕民，〈宋太宗平北漢始末〉，《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 期（1982），頁 86-94；蔣武雄，〈宋滅北漢之前與遼的交聘活動〉，《東吳歷史學報》，第 11 期（2004），頁 1-27。

景德元年（遼聖宗，972-1031；統和二十二年，1004）與遼簽訂澶淵盟約之後，兩國才又建立起長期的和平外交關係，並且經常互相派遣使節至對方朝廷進行交聘的活動，包括賀正旦、賀帝后生辰、賀即位、賀上尊號、賀冊封、回謝、告帝后駕崩、告即位、祭奠、弔慰、送遺留物、商議與訂立盟約等。<sup>2</sup> 其中正旦使和生辰使是每年必須派任的使節，也是宋遼互派使節佔有最高比例次數與人數的兩種。

當時宋朝廷對於正旦使的派任，因為必須配合在隔年元月一日前兩三天，抵達遼皇帝冬捺鉢的駐帳地，才得以如期進行祝賀遼元旦的交聘活動，因此宋朝廷往往會在每年的八、九月間，即先確定派任祝賀遼元旦的使節人選，以便讓宋朝廷和宋使節能有充分的時間，做啟程赴遼之前的各項準備，包括使節團的組成、要贈送的禮物和國書的撰擬等，並且能在十月初從汴京出發。因此當時宋朝正旦使的使遼往返時間與季節，常固定在每年冬季十月至翌年春季一月之間。

至於宋朝廷派任祝賀遼帝后生日的生辰使，因為遼帝后生辰月份不一定是在冬季，因此宋朝生辰使本來不一定會在冬季使遼。但是卻因遼朝廷採行了遼帝后生辰改期至冬季月份受賀的作法，也就造成宋使節除了正旦使是在冬季使遼之外，生辰使也大部分是在冬季使遼。

關於遼帝后生辰改期至冬季月份受賀的原因，據傅樂煥〈宋遼聘使表稿〉「丙、遼帝后生辰改期受賀考」，說：

由是窺知使臣供應之煩擾，兩國均視以為畏途。在中國重禮儀尚虛文，對此尚可安之，生活質樸簡單之塞外民族，自感不耐。而「國主自遠而至，躬親延接」一點，當亦為改期一大原因。蓋遼帝等終年遊獵，居處無定所。今為接待異國使人，須趕往三數地點，坐待無謂禮儀之舉行，其為苦事，可想像而知也……是使臣之蒞臨，打斷其「釣魚射鵝」之樂，加之於「拱手朝會」之苦，改賀之制在以上種種局勢下產生，事甚自然也。<sup>3</sup>

顯然遼帝后生辰改期至冬季月份受賀的原因是頗有其道理。傅樂煥在該文中也特別

<sup>2</sup> 可參閱聶崇岐，〈宋遼交聘考〉，收錄於氏著，《宋史叢考》（下）（臺北：華世出版社，1986），頁 286-287；黃鳳岐，〈遼宋交聘及其有關制度〉，《社會科學輯刊》，第 2 期（1985），頁 96-97。

<sup>3</sup> 傅樂煥，〈宋遼聘使表稿〉，「丙、遼帝后生辰改期受賀考」，收錄於氏著，《遼史叢考》（北京：中華書局，1994），頁 244。

列有「遼帝后生辰及受賀日期表」：<sup>4</sup>

遼 帝	生 辰	受 賀 日 期	改 或 未 改
聖 宗	十二月廿七日	十二月廿七日	未 改
興 宗	二月廿三日	正月？	改 期
道 宗	八月初七日	十二月初七日	改 期
天 祚 帝	四月十九或廿九 日	十二月？	改 期
承 天	五月五日	五月五日	未 改
齊 天	？	十一月	未 改
法 天	三月初五日	十二月初五日	改 期
宗 天	十二月初三日	？	未 改

【表一】遼帝后生辰及受賀日期表

資料來源：傅樂煥，《遼史叢考》，頁 249。

此表所列，雖然有幾個不明之處，但是我們從這一表格，已可知遼興宗(1016-1055)、道宗(1032-1101)、天祚帝(1075-1128)和法天太后(約 980-1057)四人，都是將生辰改期至冬季月份受賀。而未改期受賀者，除了承天太后(953-1009)之外，因為其他帝后的生辰本來就是在冬季的月份，因此不需要改期，即可在他們冬捺鉢的駐帳地，進行接受宋朝廷所派生辰使祝賀的交聘活動。

從以上所論，可知宋朝正旦使和生辰使的派任，以及他們使遼、赴遼、往返於遼境的時間季節月份，往往是比較固定的。據傅樂煥在〈宋遼聘使表稿〉述及宋朝正旦使、生辰使派任、啟程和抵達的時間，說：

宋遼互賀，雙方遣使，例在賀期前三、二月。如賀正旦使，例遣於九月左右。大體命既下後，受命者尚準備一二月，期前一月許始啟行。其時使臣逗留敵國都城例在十日左右，而沿途行程預有規定，無遲滯之虞，故無需早行也。考《長編》所記賀遼生辰聘使，自興宗之後，統命遣於八、九月間，與賀正旦使同時，

<sup>4</sup> 傅樂煥，〈宋遼聘使表稿〉，「丙、遼帝后生辰改期受賀考」，頁 249-250。

則到遼亦應在十二月、一月之間……繼見《長編》所載此期生辰使不獨與正旦使同遣，且確於十二月或一月與正旦使先後抵達。<sup>5</sup>

這一段話表示了在宋遼一百多年的和平外交期間，雙方所派遣的使節不僅是以正旦使、生辰使佔最多數。而且就宋國來說，擔負這兩種任務的宋使節，常常是在冬季十月初啟程赴遼，並且往返的行程也幾乎都是在冬季至隔年春季初的月份。但是假如我們進一步閱讀相關史書的記載，卻可以發現實際上在宋對遼的和平外交關係史當中，也有許多位宋使節是在春、夏、秋季的某幾個月份使遼。而且因為遼皇帝春、夏、秋捺鉢遷移的緣故，其駐帳地與冬捺鉢駐帳地不同，因此這些宋使節使遼晉見遼皇帝的地點、行程路線，以及在遼境的所見、所聞、所感，也就與冬季月份使遼的宋使節有所不同。

討論至此，使筆者進一步思考，到底有哪些原因會造成宋使節必須在冬季之外的春、夏、秋季某些月份使遼、赴遼呢？筆者認為至少約有下列四個原因：

#### 一、遼承天太后生辰未改期受賀

據前引傅樂煥所列「遼帝后生辰及受賀日期表」，可知遼承天太后的生辰是在五月五日，並且沒有改期受賀，仍然是以五月五日為其生辰受賀的日期。

關於遼承天太后生辰的日期，實際上在《續資治通鑑長編》（以下簡稱《長編》）、《契丹國志》、《宋史》，以及《遼史》〈后妃傳〉中，均未見有明確的記載。只有在《遼史》〈聖宗本紀〉，說：

統和四年（宋太宗雍熙三年，986）五月庚午（三日）……（宋）輓漕數萬人匿岐溝空城中，圍之。壬申（五日），以皇太后生辰，縱還。<sup>6</sup>

這一段記載非常難得，使我們間接知道了遼承天太后的生辰是在五月五日。筆者再以宋朝廷與遼訂立澶淵盟約之後，歷次任命使節前往遼國祝賀承天太后生辰的日期與行程，來印證承天太后的生辰日期，發現《長編》中所記載的五次任命宋臣擔任契丹國母生辰使的日期，依次是在卷五九，景德二年（遼聖宗統和二十三年，1005）

<sup>5</sup> 傅樂煥，〈宋遼聘使表稿〉，「丙、遼帝后生辰改期受賀考」，頁 241。

<sup>6</sup> （元）脫脫，《遼史》（臺北：鼎文書局，1978），卷 11，本紀第 11，〈聖宗 2〉，頁 122。

二月癸卯（二十五日）條、<sup>7</sup>卷六二，景德三年（遼聖宗統和二十四年，1006）三月乙巳（三日）條、<sup>8</sup>卷六五，景德四年（遼聖宗統和二十五年，1007）三月乙巳（八日）條、<sup>9</sup>卷六八，大中祥符元年（遼聖宗統和二十六年，1008）三月戊辰（七日）條、<sup>10</sup>卷七一，大中祥符二年（遼聖宗統和二十七年，1009）二月壬寅（十六日）條。<sup>11</sup> 此一發現，使我們進一步知道當時宋朝廷任命祝賀遼承天太后的生辰使，其日期均是在二月中旬至三月初之間，接著是準備國書、禮物、使節團員組成，以及赴遼行程的時間，因此約可在五月初到達遼聖宗夏捺鉢駐帳地，以便參與祝賀遼承天太后生辰五月五日的交聘活動。

在此筆者擬再以宋與遼訂盟後，第一次派遣使節孫僅（969-1017）使遼，祝賀承天太后五月五日生辰的情形做為印證。據《遼史》〈聖宗本紀〉，說：

統和二十三年五月戊申（一日）朔，宋遣孫僅等來賀皇太后生辰。<sup>12</sup>

可知宋使節孫僅確實是在五月五日前幾天，到達了遼聖宗和承天太后的駐帳地。至於孫僅當時祝賀承天太后生辰交聘活動的情形，據《長編》卷五九，說：

宋真宗景德二年（遼聖宗統和二十三年，1005）二月……癸卯（二十五日），命開封府推官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孫僅為契丹國母生辰使……國主（遼聖宗）每歲避暑於含涼淀，聞使至，即來幽州。屢召（孫）僅等宴會張樂，待遇之禮甚優。<sup>13</sup>

以及《宋會要輯稿》，說：

（孫）僅等廻，具言，自入境所遇州縣刺史迎謁……戎主（遼聖宗）歲避暑于含涼淀，聞使至，即來幽州，其館舍供帳接待之禮甚厚。<sup>14</sup>

此二段引文，提到「國主（遼聖宗）每歲避暑於含涼淀，聞使至，即來幽州」、「戎

<sup>7</sup>（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卷 59，〈宋真宗景德二年二月癸卯條〉，頁 11。

<sup>8</sup>（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62，〈宋真宗景德三年三月乙巳條〉，頁 8。

<sup>9</sup>（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65，〈宋真宗景德四年三月乙巳條〉，頁 5。

<sup>10</sup>（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68，〈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三月戊辰條〉，頁 9。

<sup>11</sup>（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71，〈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二月壬寅條〉，頁 8。

<sup>12</sup>（元）脫脫，《遼史》，卷 14，本紀第 14，〈聖宗 5〉，頁 161。

<sup>13</sup>（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71，〈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二月壬寅條〉，頁 8。

<sup>14</sup>（清）徐松，《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97），〈蕃夷 1 之 34〉，頁 7689。

主歲避暑于含涼淀，聞使至，即來幽州」，皆可印證遼承天太后生辰並未改期受賀，仍然維持在五月五日，因此當宋使節生辰使孫僅前往祝賀時，他往返於遼境的行程是在夏季的四、五月份，而不是在冬季的月份。

## 二、遼帝后死亡與新君登位

宋遼兩國的交聘活動，其中有一項是當某一方的帝后死亡時，另一方必須派遣使節至該國祭奠、弔慰和祝賀新君登位。因此宋朝廷每年除了派遣正旦使、生辰使，祝賀遼元旦和帝后生辰之外，當遼國帝后死亡時，宋朝廷也會配合遼帝后死亡哀喪活動的日期，以及新君登位的日期，派遣使節赴遼。因此他們使遼的時間與季節，也就有可能是在春、夏、秋、冬季的任何月份，筆者特舉下列六件史事為例，加以討論：

（一）以遼承天太后的死亡為例：關於遼承天太后死亡的日期，據《遼史》〈聖宗本紀〉，說：

統和二十七年（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十二月……辛卯（十一日），皇太后崩于行宮。<sup>15</sup>

以及《遼史》〈后妃傳〉，說：

（遼）景宗睿智皇后蕭氏……景宗崩，尊為皇太后……統和元年（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上尊號曰承天皇太后……二十七年崩。<sup>16</sup>

由於承天太后的死亡，是宋遼兩國訂立澶淵盟約，建立起友好和平關係之後，第一位死亡的遼方領導者，也是第一位死亡的遼方皇太后，因此宋遼兩國朝廷對於其哀喪的交聘活動都相當重視。據《遼史》〈聖宗本紀〉，提到宋國派遣使節前來進行哀喪交聘活動的相關日程，說：

統和二十七年……十二月……壬辰（十二日），遣使報哀于宋、夏、高麗……二十八年（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二月丙戌（六日），宋遣王隨（約 975-

<sup>15</sup> （元）脫脫，《遼史》，卷 14，本紀第 14，〈聖宗 5〉，頁 164。

<sup>16</sup> （元）脫脫，《遼史》，卷 71，列傳第 1，〈后妃·景宗睿智皇后蕭氏〉，頁 1201-1202。



1033)、王儒等來弔祭……是月，遣左龍虎衛上將軍蕭合卓饋大行皇太后遺物于宋，仍遣臨海軍節度使蕭虛列、左領軍衛上將軍張崇濟謝宋弔祭。三月……是月，宋、高麗遣使來會葬。<sup>17</sup>

筆者再另查宋人著作，據《長編》卷七二，說：

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十二月……癸卯（二十三日），契丹國母蕭氏卒，年五十七，謚曰：宣獻。契丹主哭必嘔血，遣天平節度使耶律信寧，馳騎來告，涿州先牒雄州，雄州以聞。甲辰（二十四日），詔廢朝七日，令禮官詳定服制，內出開寶禮，為蕃國發哀儀，下輔臣使參擇而行。復命太常博士直史館王隨，內殿承制閣門祇候郭允恭為祭奠使。太常博士判三司催欠憑由司王曙（963-1034），供奉閣門祇候王承瑾為弔慰使。賻以衣五襲，綾羅帛萬疋。<sup>18</sup>

從以上所論，可知遼承天太后是在遼統和二十七年冬季十二月十一日死亡，而宋朝廷所派遣的祭奠使、弔慰使是在二月六日至遼國進行弔祭，並且在三月時，宋使節曾參與會葬的活動。顯現出宋使節當時是在春季的一、二、三月間使遼、赴遼、往返於遼境，進行遼承天太后死亡的祭奠、弔慰和會葬活動。

（二）以遼聖宗的死亡和遼興宗登位為例：遼聖宗的死亡日期，據《遼史》〈興宗本紀〉，說：

太平十一年（宋仁宗 1010-1063 天聖九年，1031）夏六月己卯（三日），聖宗崩，（興宗）即皇帝位於柩前……甲申（八日），遣使告哀于宋及夏、高麗。<sup>19</sup>

而宋朝廷則是在六月「己亥（二十三日），雄州以契丹主訃聞。」<sup>20</sup> 此為從宋太祖與遼進行過短暫和平外交，以及宋真宗與遼簽訂澶淵盟約，再度建立起長期和平外交之後，第一次遼方皇帝的死亡。因此當六月二十三日，宋仁宗得知遼聖宗的死訊時，即在「辛丑（二十五日），輟視朝七日，在京及河北、河東緣邊亦禁音樂七日。命御史中丞王隨為祭奠使……龍圖待制孔道輔（986-1039）為賀登位使……龍圖閣

<sup>17</sup>（元）脫脫，《遼史》，卷 14，本紀第 14，〈聖宗 5〉，頁 164；（元）脫脫，《遼史》，卷 15，本紀第 15，〈聖宗 6〉，頁 167。

<sup>18</sup>（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72，〈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十二月癸卯條〉，頁 21。

<sup>19</sup>（元）脫脫，《遼史》，卷 18，本紀第 18，〈興宗 1〉，頁 211。

<sup>20</sup>（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110，〈宋仁宗天聖九年六月己亥條〉，頁 10。

待制梅詢（964-1041）為國母弔慰使……鹽鐵副使司封員外郎王巖（978-1041）為國主弔慰使。」<sup>21</sup>《宋史》〈仁宗本紀〉，也說：

天聖九年（遼聖宗太平十一年，1031）……秋七月丙午（一日）朔，契丹使來告其主隆緒殂，遣使祭奠、弔慰，及賀宗真立。<sup>22</sup>

另外，《遼史》〈興宗本紀〉記載宋使節參與此次哀喪活動的情形，說：

景福元年（宋仁宗天聖九年，1031）九月……辛亥（六日），宋遣王隨、曹儀致祭，王巖、許懷信、梅詢、張綸來慰兩宮，范諷、孫繼業賀即位，孔道輔、魏昭文賀皇太后冊禮……庚午（二十五日），以宋使弔祭，喪服臨殿塗殿。<sup>23</sup>

可知當時遼聖宗是在遼太平十一年夏季六月三日死亡，因此宋使節在秋季的八、九月份使遼、赴遼、往返於遼境，進行遼聖宗死亡的祭奠、弔慰，以及祝賀新君遼興宗登位的交聘活動。

（三）以遼興宗的死亡和遼道宗登位為例：遼興宗的死亡日期，據《遼史》〈興宗本紀〉，說：

重熙二十四年（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八月己丑（初四日），帝（遼興宗）崩於行宮，年四十。<sup>24</sup>

以及《長編》卷一八〇，說：

宋仁宗至和二年（遼興宗重熙二十四年，1055）八月……己丑（四日），契丹主宗真卒，立二十五年，年四十一，諡文成皇帝，廟號興宗。<sup>25</sup>

但是當時宋朝廷並未能即時得知遼興宗的死訊，因此在八月十六日，仍然按照往例任命該年出使遼國的生辰使與正旦使人選，以「翰林學士吏部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歐陽修（1007-1072）為契丹國母生辰使……右正言知制誥劉敞（1019-1068）為契

<sup>21</sup>（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10，〈宋仁宗天聖九年六月辛丑條〉，頁10。

<sup>22</sup>（元）脫脫，《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78），卷9，本紀第9，〈仁宗1〉，頁189。

<sup>23</sup>（元）脫脫，《遼史》，卷18，本紀第18，〈興宗1〉，頁212。

<sup>24</sup>（元）脫脫，《遼史》，卷20，本紀第20，〈興宗3〉，頁248。

<sup>25</sup>（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80，〈宋仁宗至和二年八月己丑條〉，頁16。

丹生辰使……起居舍人直秘閣知諫院范鎮(1007-1088)為契丹國母正旦使……權度支判官刑部員外郎李復圭為契丹正旦使……時朝廷未知契丹主已卒，故生辰、正旦遣使如例。<sup>26</sup> 一直至八月「辛亥(二十六日)，雄州以契丹主之喪來奏」，<sup>27</sup>宋朝廷才得知此事，遂在八月「癸丑(二十八日)」，改命歐陽修……為賀契丹登寶位使，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1007-1073)為契丹祭奠使……鹽鐵副使工部郎中李參(1006-1079)為契丹弔慰使……甲寅(二十九日)，改命劉敞……為契丹國母生辰使，戶部副使工部郎中張揅(996-1074)為契丹生辰使。」<sup>28</sup>《宋史》〈仁宗本紀〉，也說：

至和二年(遼道宗清寧元年，1055)……九月戊午(三日)，契丹使來告其國主宗真殂，帝為發哀，成服于內東門幕次，遣使祭奠、弔慰，及賀其子洪基立。<sup>29</sup>

至於遼興宗死亡的哀喪和遼道宗登位事宜，《遼史》〈道宗本紀〉，則只簡單說：

清寧元年(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十一月甲子(十日)，葬興宗皇帝於慶陵，宋及高麗遣使來會……十二月……戊子(五日)，應聖節，上太皇太后壽……丙申(十三日)，宋遣歐陽修等來賀即位。<sup>30</sup>

但是我們從以上的論述，已可知遼興宗在遼重熙二十四年秋季八月四日死亡，因此宋使節在冬季的十、十一、十二月使遼、赴遼、往返於遼境，進行遼興宗死亡的祭奠、弔慰，和祝賀新君遼道宗登位的活動。

(四)以遼道宗的死亡和遼天祚帝登位為例：遼道宗的死亡日期，據《遼史》〈道宗本紀〉，說：

壽隆七年(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正月甲戌(十三日)，上(遼道宗)崩於行宮，年七十。遺詔燕國王延禧嗣位。<sup>31</sup>

<sup>26</sup>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80，〈宋仁宗至和二年八月辛丑條〉，頁18。

<sup>27</sup>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80，〈宋仁宗至和二年八月辛亥條〉，頁18。

<sup>28</sup>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80，〈宋仁宗至和二年八月癸丑條〉，頁19；(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80，〈宋仁宗至和二年八月甲寅條〉，頁19。

<sup>29</sup> (元)脫脫，《宋史》，卷12，本紀第12，〈仁宗4〉，頁238。

<sup>30</sup> (元)脫脫，《遼史》，卷21，本紀第21，〈道宗1〉，頁252-253。

<sup>31</sup> (元)脫脫，《遼史》，卷26，本紀第26，〈道宗6〉，頁314。

但是關於宋朝廷此次派任大臣使遼祭奠、弔慰和祝賀新君遼天祚帝登位事宜的記載，因現存《長編》缺失，筆者另查《宋會要輯稿》，說：

（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遼道宗壽隆七年，1101）二月十四日，命尚書吏部侍郎張舜民為遼國賀登位國信使……中書舍人謝文瓘（1021-1096）為遼國祭奠國信使……尚書工部侍郎賈易為遼國弔慰國信使……易以目疾辭，改命給事中上官均（1038-1115）代之。又命朝散大夫淮南江浙等路發運副使黃寔，龍圖閣直學士中散大夫為遼國賀登位國信使，代張舜民。<sup>32</sup>

《宋史》〈徽宗本紀〉，也說：

建中靖國元年，三月……乙丑（四日），遼遣使蕭恭來告其國主洪基殂，遣謝文瓘、上官均等往弔祭，黃寔賀其孫延禧立。<sup>33</sup>

關於此些事宜，雖然《遼史》〈天祚皇帝本紀〉，只說：

乾統元年（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六月……甲午（五日），宋遣王潛等來弔祭……十二月……癸巳（七日），宋遣黃實來賀即位。<sup>34</sup>

而且與《宋會要輯稿》、《宋史》在人名的記載上也或有不同，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從以上各項記載，得知遼道宗是在壽隆七年春季正月十三日死亡，並且推知此次宋使節是在夏季五、六月份使遼，進行遼道宗死亡的祭奠、弔慰儀式活動，以及在冬季十一、十二月份使遼，進行祝賀新君遼天祚帝的登位儀式活動。

（五）以遼法天太后的死亡為例：遼法天太后的死亡日期，據《遼史》〈道宗本紀〉，說：

清寧三年（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十二月……己巳（二十七日），太皇太后（法天太后）崩……四年（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夏四月……丁卯（三日），宋遣使弔祭。<sup>35</sup>

<sup>32</sup>（清）徐松，《宋會要輯稿》，職官 51 之 8，頁 3540。

<sup>33</sup>（元）脫脫，《宋史》，卷 19，本紀第 19，〈徽宗 1〉，頁 361。

<sup>34</sup>（元）脫脫，《遼史》，卷 27，本紀第 27，〈天祚皇帝 1〉，頁 318。

<sup>35</sup>（元）脫脫，《遼史》，卷 21，本紀第 21，〈道宗 1〉，頁 256。

當時宋朝廷在翌年正月，以「侍御史朱處約假左諫議大夫為祭奠使……度支判官兵部員外郎集賢校理李仲師為弔慰使。」<sup>36</sup>而《宋史》〈仁宗本紀〉，也說：

嘉祐三年（遼道宗清寧四年，1058）……二月癸卯（二日），契丹使來告其祖母哀，輟視朝七日，遣使祭奠、弔慰。<sup>37</sup>

從以上各書的記載，我們可知遼法天太后在遼道宗清寧三年冬季十二月二十七日死亡，而宋使節是在隔年春夏之際三、四月份使遼，進行遼法天太后死亡的祭奠、弔慰儀式活動。

（六）以遼宗天太后的死亡為例：遼宗天太后的死亡日期，據《遼史》〈道宗本紀〉，說：

大康二年（宋神宗熙寧九年，1076）三月辛酉（六日），皇太后（宗天太后）崩……夏六月……戊子（四日），宋及高麗、夏國各遣使弔祭。<sup>38</sup>

當時宋朝廷在同年四月二十一日，以「戶部度支郎中王克臣（1014-1089）為遼國母祭奠使……太常丞集賢校理蒲宗孟（1022-1088）為遼國母祭弔慰使。」<sup>39</sup>《宋史》〈神宗本紀〉，也說：

熙寧九年（遼道宗大康二年，1076）夏四月……乙未（十日），以遼主母喪……丙午（二十一日），遣王克臣等弔慰于遼。<sup>40</sup>

從這三項史書的記載，我們可知遼宗天太后在遼道宗大康二年春季三月六日死亡，宋使節則在夏季五、六月份使遼，進行遼宗天太后死亡的祭奠、弔慰儀式活動。

綜合以上六件史實的論述，可謂已經很清楚地顯現出，在宋遼長期和平的交聘活動中，宋朝使節雖然以正旦使、生辰使佔大多數，而且他們使遼、赴遼、往返於遼境的時間，往往固定在冬季的月份。但是當遼朝帝后死亡與新君登位時，宋朝的祭奠使、弔慰使和賀遼帝登位使，就有可能在春、夏、秋、冬四個季節的任何月份

<sup>36</sup>（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187，〈宋仁宗嘉祐三年正月己亥條〉，頁 2。

<sup>37</sup>（元）脫脫，《宋史》，卷 12，本紀第 12，〈仁宗 4〉，頁 242。

<sup>38</sup>（元）脫脫，《遼史》，卷 23，本紀第 23，〈道宗 3〉，頁 277。

<sup>39</sup>（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274，〈宋神宗熙寧九年四月丙午條〉，頁 9。

<sup>40</sup>（元）脫脫，《宋史》，卷 15，本紀第 15，〈神宗 2〉，頁 290。

使遼、赴遼，和往返於遼境。

### 三、宋帝死亡與新君登位

當時宋遼兩國的哀喪交聘活動是互相的，因此當宋帝死亡時，遼方會派遣祭奠使、弔慰使和祝賀新君登位使至宋。而宋朝廷也會派遣告哀使、告登位使、致先帝遺留物使和回謝使至遼，因此宋使節在此情況下，即有可能在春、夏、秋、冬季的任何月份使遼、赴遼。筆者亦舉六件史實為例，加以論述：

（一）以宋太祖的死亡和宋太宗登位為例：由於宋遼兩國曾在宋太祖和宋太宗初期有過一段短暫約六年的和平時期，因此當宋太祖死亡與宋太宗登位時，宋朝廷基於兩國的和平外交關係，曾先後派遣告哀使、告登位使、致先帝遺留物使和回謝使等出使遼國。據《長編》卷一七，說：

（宋太祖）開寶九年（遼景宗保寧八年，976）……十月……癸丑（二十日），上（宋太祖）崩于萬歲殿……甲寅（二十一日），太宗即位……太平興國元年（即開寶九年）十一月……壬午（二十日），遣著作郎馮正、著作佐郎張玘使契丹，告終稱嗣也。<sup>41</sup>

《宋史》〈太宗本紀〉，說：

（宋太祖）開寶九年冬十月癸丑（二十日），太祖崩，帝（太宗）遂即皇帝位……十一月……己丑（二十七日），遣著作郎馮正、佐郎張玘使契丹告哀。<sup>42</sup>

以及《文獻通考》，說：

（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遼景宗保寧九年，977），（遼）遣使賀太宗即位。四月，又遣使奉貢助太祖山陵。五月，令起居舍人辛仲甫等報聘。<sup>43</sup>

另外，《遼史》〈景宗本紀〉，也說：

<sup>41</sup>（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17，〈宋太祖開寶九年十月癸丑條〉，頁 16；（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17，〈宋太祖開寶九年十月甲寅條〉，頁 17；（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17，〈宋太宗太平興國元年十一月壬午條〉，頁 21。

<sup>42</sup>（元）脫脫，《宋史》，卷 4，本紀第 4，〈太宗 1〉，頁 54。

<sup>43</sup>（元）馬端臨，《文獻通考》（臺北：新興書局，1958），卷 346，四裔考 23，〈契丹中〉，頁 2707。

保寧八年（宋太祖開寶九年，976）十一月丙子（十四日），宋主匡胤殂，其弟  
炅自立，遣使來告……九年（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977）二月庚子（九日），  
宋遣使致其先帝遺物……秋七月……甲子（五日），宋遣使來聘。<sup>44</sup>

從以上各項史書的記載，可知宋太祖在開寶九年冬季十月二十日死後，宋遼兩國進行了一系列的哀喪交聘活動。而在宋國方面，宋朝廷所派的告哀使、告登位使是在冬季的月份使遼，至於後來所派負責致先帝遺留物和回謝的使節，則是在隔年春季與夏、秋之際的月份使遼。

（二）以宋真宗的死亡和宋仁宗登位為例：有關宋真宗死亡之後，宋與遼所進行的哀喪交聘活動，據《長編》卷九八，說：

（宋真宗）乾興元年（遼聖宗太平二年，1022）二月戊午（十九日），上（宋真宗）崩於延慶殿。（宋）仁宗即皇帝位……遣內殿承制閣門祇候薛貽廓告哀契丹……二月丙寅（二十七日），遣度支副使禮部郎中薛田為契丹遺留禮信使，供備庫副使李餘懿副之……四月壬子（十三日），命兵部員外郎判鹽鐵勾院任中行、崇儀副使曹珣使契丹，告皇帝初登位也……七月乙亥（七日），戶部郎中直史館劉鋹為皇后（皇太后）回謝契丹使，客省副使曹儀副之。工部郎中趙賀為皇帝回謝使，內殿承制閣門祇候楊承吉副之。<sup>45</sup>

《宋史》〈仁宗本紀〉，說：

（宋真宗）乾興元年二月戊午（十九日），真宗崩，遣詔太子即皇帝位……遣使告哀契丹……丙寅（二十七日），遣使以先帝遺留物遺契丹……夏四月壬子（十三日），遣使以即位告契丹。<sup>46</sup>

以及《遼史》〈聖宗本紀〉，說：

<sup>44</sup> （元）脫脫，《遼史》，卷8，本紀第8，〈景宗上〉，頁96；（元）脫脫，《遼史》，卷9，本紀第9，〈景宗下〉，頁99。

<sup>45</sup>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98，〈宋真宗乾興元年二月戊午條〉，頁3；（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98，〈宋真宗乾興元年二月丙寅條〉，頁5；（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98，〈宋真宗乾興元年四月壬子條〉，頁10；（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99，〈宋真宗乾興元年七月乙亥條〉，頁2。

<sup>46</sup> （元）脫脫，《宋史》，卷9，本紀第9，〈仁宗1〉，頁175-176。

太平二年（宋真宗乾興元年，1022）……三月……丁丑（八日），宋使薛貽廓來告宋主恒（宋真宗）殂，子禎（宋仁宗）嗣位……六月己未（二十一日），宋遣使薛田等來饋其先帝遺物……十一月丙戌（二十日），宋遣使來謝。<sup>47</sup>

從以上各項史書的記載，可知宋真宗在乾興元年春季二月十九日死後，宋遼兩國所進行一系列的哀喪交聘活動，宋朝廷派遣的告哀使赴遼是在春季的月份，告登位使和遺留禮信使赴遼是在夏季的月份，而回謝使赴遼，則是在冬季的月份。

（三）以宋仁宗的死亡和宋英宗登位為例：宋仁宗死亡之後，與遼所進行一系列的哀喪交聘活動，在《長編》、《宋史》、《遼史》中均記載不多，例如《長編》卷一九八，說：

（宋仁宗）嘉祐八年（遼道宗清寧九年，1063）三月辛未（三十日）晦，上（宋仁宗）暴崩於福寧殿……夏四月壬申朔（一日），英宗即皇帝位……癸酉（二日）……命引進副使王道恭告哀契丹。<sup>48</sup>

《宋史》〈仁宗本紀〉，說：

嘉祐八年三月……辛未，帝崩于福寧殿。遺制皇子即皇帝位。<sup>49</sup>

〈英宗本紀〉，則說：

（宋仁宗）嘉祐……八年，仁宗崩。夏四月壬申朔（一日），皇后傳遺詔，命帝嗣皇帝位……癸酉（二日）……遣王道恭告哀于契丹……乙亥，遣韓贊等告即位於于契丹。<sup>50</sup>

而《遼史》〈道宗本紀〉，也只記載：

清寧九年（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三月辛未（三十日），宋主禎殂，以姪

<sup>47</sup>（元）脫脫，《遼史》，卷16，本紀第16，〈聖宗7〉，頁190-191。

<sup>48</sup>（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98，〈宋仁宗嘉祐八年三月辛未條〉，頁3；（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98，〈宋仁宗嘉祐八年四月壬申條〉，頁3；（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98，〈宋仁宗嘉祐八年四月癸酉條〉，頁5。

<sup>49</sup>（元）脫脫，《宋史》，卷12，本紀第12，〈仁宗4〉，頁250。

<sup>50</sup>（元）脫脫，《宋史》，卷13，本紀第13，〈英宗〉，頁254。



曙為子嗣位。<sup>51</sup>

但是我們至少已可知宋仁宗在嘉祐八年三月三十日死後，宋朝廷所派的告哀使、告登位使，均是在夏季的月份使遼。

（四）以宋英宗的死亡和宋神宗登位為例：宋英宗死於治平四年（遼道宗咸雍三年，1067），據《長編》卷二〇九，說：

（宋英宗）治平四年春正月……丁巳（八日），帝（英宗）崩於福寧殿。神宗即位。<sup>52</sup>

由於《長編》自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四月至宋神宗熙寧三年（1070）三月佚失，因此有關宋英宗死後各項與遼進行的哀喪事宜交聘活動，筆者另據《宋史》〈英宗本紀〉，說：

治平四年春正月……丁巳（八日），帝（英宗）崩于福寧殿。<sup>53</sup>

〈神宗本紀〉，說：

（宋英宗治平）四年正月丁巳（八日），英廟（英宗）崩，帝（神宗）即皇帝位。戊午（九日）……遣馮行己（1008-1091）告哀于遼……辛酉（十二日），遣孫坦等告即位于遼……九月，辛卯（二十一日）……遣孫思恭（1009-1069）等報謝于遼。<sup>54</sup>

以及《遼史》〈道宗本紀〉，說：

咸雍三年（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三月癸亥（十四日），宋主曙殂，子頊嗣位，遣使告哀……六月……庚戌（二十日），宋遣使饋其先帝遺物。辛亥（二十一日），宋以即位遣陳襄（1017-1080）來報。<sup>55</sup>

可知宋英宗在治平四年春季正月八日死亡之後，宋朝廷所派使遼的告哀使、致遺留

<sup>51</sup>（元）脫脫，《遼史》，卷22，本紀第22，〈道宗2〉，頁262。

<sup>52</sup>（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209，〈宋英宗治平四年正月丁巳條〉，頁1。

<sup>53</sup>（元）脫脫，《宋史》，卷13，本紀第13，〈英宗〉，頁260。

<sup>54</sup>（元）脫脫，《宋史》，卷14，本紀第14，〈神宗1〉，頁264、266。

<sup>55</sup>（元）脫脫，《遼史》，卷22，本紀第22，〈道宗2〉，頁266。

物使和告登位使，是在春、夏的月份使遼、赴遼，而回謝使則是在秋季的月份。

（五）以宋神宗的死亡和宋哲宗登位為例：宋神宗死於元豐八年（遼道宗大安元年，1085），據《長編》卷三五三，說：

宋神宗元豐八年三月……戊戌（五日），上（神宗）崩于福寧殿。哲宗即位……己亥（六日）……命閤門通事舍人宋球告哀于遼，權改名淵……四月辛巳（十八日），遣承議郎試中書省舍人王震（1045-1095）為大行皇帝遺留北朝禮信使，內殿承制騫育副之。承議郎左司郎中滿中行充皇帝登寶位北朝國信使……九月己酉（十八日），承議郎龍圖閣直學士蔡卞（1048-1117）為太皇太后（神宗死，哲宗年幼，哲宗祖母臨朝）回謝遼國使……中書舍人范百祿（1030-1094）為皇帝回謝遼國使。<sup>56</sup>

《宋史》〈神宗本紀〉，說：

元豐八年……三月……戊戌（五日），上崩于福寧殿……皇太子即皇帝位。<sup>57</sup>

《宋史》〈哲宗本紀〉，說：

（宋神宗）元豐……八年……三月……戊戌（五日），神宗崩，太子即皇帝位。己亥（六日）……遣使告哀于遼……夏四月……辛巳（十八日），遣使以先帝遺留物遺遼國及告即位……九月……己酉（十八日），遣使報謝于遼。<sup>58</sup>

另外，《遼史》〈道宗本紀〉，也說：

大安元年（宋神宗元豐八年，1085）……夏四月乙酉（二十二日），宋主頊殂，子煦嗣位，使來告哀……六月戊寅（十六日），宋遣王真、甄祐等饋其先帝遺物……十二月甲戌（十四日），宋遣蔡卞來謝弔祭。<sup>59</sup>

<sup>56</sup>（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353，〈宋神宗元豐八年三月戊戌條〉，頁3；（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353，〈宋神宗元豐八年三月己亥條〉，頁4；（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355，〈宋神宗元豐八年四月辛巳條〉，頁9；（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359，〈宋神宗元豐八年九月己酉條〉，頁17。

<sup>57</sup>（元）脫脫，《宋史》，卷16，本紀第16，〈神宗3〉，頁313。

<sup>58</sup>（元）脫脫，《宋史》，卷17，本紀第17，〈哲宗1〉，頁317-319。

<sup>59</sup>（元）脫脫，《遼史》，卷24，本紀第24，〈道宗4〉，頁290-291。

因此可知宋神宗在元豐八年春季三月五日死亡之後，宋朝廷所派使遼的告哀使、致遺留物使、告登寶位使和回謝使，其赴遼時間分別為夏、秋、冬季的月份。

(六)以宋哲宗的死亡和宋徽宗登位為例：宋哲宗死於元符三年(遼道宗壽隆六年，1100)正月己卯(十二日)，因《長編》缺少此年史事記載，因此據《宋會要輯稿》，說：

宋哲宗元符三年二月二十九日，命尚書工部侍郎杜常假龍圖閣直學士，為大行皇帝遺留遼國禮信使……三月九日，河北路計定(度)轉運副使吳安憲假寶文閣待制，充大行皇帝遺留北朝禮信使，以杜常至澶州稱疾而回故也。<sup>60</sup>

《宋史》〈哲宗本紀〉，說：

元符三年春正月……己卯(十二日)，帝崩……立弟端王太即位于柩前。<sup>61</sup>

〈徽宗本紀〉，說：

(宋哲宗)元符三年正月己卯(十二日)，哲宗崩……乃召端王入，即皇帝位……庚辰……遣宋淵告哀于遼……二月……丙寅(二十九日)，遣吳安憲、朱孝孫以遺留物遺遼國主……三月……庚午(三日)，遣韓治、曹譜告即位于遼……秋七月……癸未(十八日)，遣陸佃、李嗣徽報謝于遼。<sup>62</sup>

另外，《遼史》〈道宗本紀〉，也說：

壽隆六年(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二月……辛酉(二十四日)，宋遣使告宋主煦殂，弟侁嗣位……五月辛卯(四日)，宋遣使饋先帝遺物……十二月……庚申(二十九日)……宋遣使來謝。<sup>63</sup>

因此可知宋哲宗在元符三年春季正月十二日死後，宋朝廷所派使遼的告哀使、致遺留物使、告登位使和回謝使，其赴遼時間分別為春、夏、冬季的月份。

<sup>60</sup>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禮 29 之 70〉，頁 1098。

<sup>61</sup> (元)脫脫，《宋史》，卷 18，本紀第 18，〈哲宗 2〉，頁 354。

<sup>62</sup> (元)脫脫，《宋史》，卷 19，本紀第 19，〈徽宗 1〉，頁 357-359。

<sup>63</sup> (元)脫脫，《遼史》，卷 26，本紀第 26，〈道宗 6〉，頁 312-314。

筆者認為，綜合以上六項史實的論述，應已足以印證當宋朝皇帝死亡與新君登位時，宋朝廷所派使遼的告哀使、告登位使、致遺留物使和回謝使，確實都有可能在春、夏、秋、冬四季的任何月份使遼、赴遼和往返於遼境。

#### 四、宋派遣泛使

在宋遼交聘活動中，有一種使節的名稱，依其特殊的任務，通稱為泛使。據聶崇岐〈宋遼交聘考〉，說：「普通聘問或有所報告要求於鄰邦者，曰國信使，俗稱泛使……正旦生辰二使皆每年互遣，泛使則無定期，餘皆因事選派，亦無固定年月。」<sup>64</sup> 傅樂煥〈宋遼聘使表稿〉（三），附考，「庚、宋遼泛使表」，說：「宋遼通好期間遇有特殊事故，另遣專使，特名泛使以達意。」<sup>65</sup> 另外，賈玉英在〈有關宋遼交聘中泛使概念的幾點辨析〉一文中，對於泛使有比較詳細的分析，其說：

泛使是宋遼交聘中重要的使節，宋真宗以後，宋遼關係的每次重大變化，泛使無不率先斡旋其間，肩負著重要的使命……宋遼交聘中眾多的使節，如果以派遣的目的為線索劃分，可分為兩大類……第二類是商議重大事務的特別使節，主要是指泛使、橫使、報聘使、審行商議使等。第二類使節與宋遼關係的重要變化密切相關，尤其是泛使，澶淵之盟以後宋遼關係每一次重大變故，泛使無不率先斡旋其間，起著重要的作用。<sup>66</sup>

從以上三位學者所言，可知宋遼泛使的派遣，往往是在雙方有比較重大事故的時候，因此在一年春、夏、秋、冬四季當中，均有可能隨著兩國外交局勢的需要而派遣。關於此種情形，傅樂煥在〈宋遼聘使表稿〉中作有「宋遼泛使表」，筆者在此特別加以轉引，但是為了配合本文主題的論述，只從該表挑出屬於宋朝泛使出使遼國的部分，作成下表：<sup>67</sup>

派遣或到達年月	遣使國	使名	任 務	備 考
大中祥符元年六月 1008	宋	孫奭	告封禪泰山	僅及契丹境交授書函而返

<sup>64</sup> 聶崇岐，〈宋遼交聘考〉，頁 287。

<sup>65</sup> 傅樂煥，〈宋遼聘使表稿〉，頁 261。

<sup>66</sup> 賈玉英，〈有關宋遼交聘中泛使概念的幾點辨析〉，《中國史研究》，第 2 期（2008），頁 111-118。

<sup>67</sup> 傅樂煥，〈宋遼聘使表稿〉，「庚、宋遼泛使表」，頁 261-263。

天聖四年三月 1026	宋	李維	時傳言契丹將絕盟，遣維闕之	
康定元年七月 1040	宋	郭稹 夏防	告出兵西夏	
慶曆二年四月 1042	宋	富弼 張茂實	報蕭英之使	
慶曆二年七月 1042	宋	富弼 張茂實	再議關南地事	
慶曆二年十月 1042	宋	梁適	報蕭偕之使	
慶曆四年八月 1044	宋	余靖	報耶律衡元之使	
皇祐元年三月 1049	宋	錢明逸 向傳範	報蕭惟信之使	
皇祐二年三月 1050	宋	趙槩 錢晦	報耶律益等之使	
至和元年九月 1054	宋	王拱辰 李絢	報蕭德之使	
嘉祐二年三月 1057	宋	張昇 劉永年	報耶律防之使	
嘉祐二年十月 1057	宋	胡宿 李綬	報蕭扈等之使	
治平二年六月 1065	宋		與契丹議界	使名未詳
熙寧七年三月 1074	宋	韓縝	報蕭禧之使	
熙寧八年三月 1075	宋	沈括 李評	報蕭禧之使	
壽隆四年春（到） 1098	宋		饋遼錦綺	此據遼史，用遼年號，使名不詳
元符二年四月 1099	宋	郭知章 宋深	報蕭德崇之使	
崇寧四年五月 1105	宋	林攄	報蕭良之使	
崇寧四年八月 1105	宋	劉正夫	林攄使事未畢，正夫再往	
乾統五年五月（到） 1105	宋	曾孝廣 王戩	（不詳）	此據遼史，用遼年號
天慶五年七月（到） 1115	宋		饋遼銀絹	此據遼史，用遼年號

【表二】宋使遼泛史表

資料來源：傅樂煥，《遼史叢考》，頁 261-263。

從這一表格所列宋朝廷派任泛使的時間，我們可以清楚看出，宋朝泛使使遼往返的

時間，屬於春、夏、秋三季的月份確實比較多。筆者為了進一步使讀者能更加明瞭起見，擬再舉三位宋朝廷所派的泛使使遼時間與情形為例，說明宋朝泛使的使遼時間與季節，常不同於宋朝廷派遣的正旦使、生辰使。

在宋遼兩國長達一百多年的和平外交當中，曾經有過兩次比較重大的交涉事件，一件是發生於宋仁宗慶曆元、二年（遼興宗重熙十、十一年，1041、1042）的宋遼增幣交涉事件，<sup>68</sup>另一件是發生於宋神宗熙寧六至九年（遼道宗咸雍九年至大康二年，1073 至 1076）的宋遼河東劃界交涉事件。<sup>69</sup> 在這種雙方交涉、折衝、辯駁的過程中，很顯然的，宋朝廷為了配合交涉事宜的進行和實際的需要，會彈性地派遣泛使至遼國。因此這一類宋使節就有可能在一年當中四個季節的任何月份使遼，而不一定是在冬季的月份。在此筆者特別舉宋遼增幣交涉中的富弼（1004-1083），以及宋遼河東劃界交涉中的韓績（1019-1097）、沈括（1031-1095）等三位泛使為例，討論宋使節在不同時間、季節使遼的原因。

富弼在宋遼增幣交涉事件的過程中，曾經兩次使遼。首先據《長編》卷一三五、卷一三七，說：

先是，西兵久不決，（劉）六符以中國為怯且厭兵，因教其主聚兵幽、涿，聲言欲入寇。而六符及（蕭）英先以書來求關南十縣。先是，正月己巳（二十六日），

<sup>68</sup> 宋遼（遼宋）增幣交涉為宋遼外交史上的大事，長期以來受到學者的關注，發表多篇文章，分別從宋國、遼國、人物等面向加以探討，例如有陶晉生，〈北宋慶曆改革前後的外交政策〉，《宋遼關係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第四章，頁 59-95；羅繼祖，〈關於“慶曆增幣”〉，《學習與探索》，第 6 期（1986），頁 126-127、轉 83；賀達、劉仁亮，〈富弼與慶曆增幣簡論〉，《河北師院學報》，第 3 期（1991），頁 19-25；朱小琴，〈宋遼關南地之爭〉，《西安教育學院學報》，第 2 期（2000），頁 61-66；王德毅，〈富弼使遼增幣交涉述評〉，張希清編，《澶淵之盟新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頁 279-298；鄭偉佳，〈試論“重熙增幣”〉，《河北北方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4 卷第 2 期（2008），頁 29-31、轉 35；蔣武雄，〈遼代劉六符兄弟與遼宋外交〉，《中央大學人文學報》，第 57 期（2014），頁 1-35。

<sup>69</sup> 宋遼（遼宋）劃界交涉為宋遼外交史上引起頗多爭議的大事，長期以來學者相當關注，例如有李之勤，〈熙寧年間宋遼河東邊界交涉研究——王安石棄地數百里說質疑〉，《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1 期（1980），頁 18-24；李之勤，〈最早誣蔑王安石棄地的不是邵伯溫而是蘇轍〉，《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 期（1980），頁 63-69；藍克利，〈政治與地理論辯——1075 年的宋遼邊界談判〉，田餘慶編，《慶祝鄧廣銘教授九十華誕論文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頁 182-197；彭鳳萍，〈淺析沈括使遼地界誤朝說〉，《益陽師專學報》，第 22 卷第 1 期（2001），頁 60-62；毛利英介，〈一〇七四から七六六年におけキタイ（遼）、宋開の地界交渉發生の原因について——特にキタイ側の視點から〉，《東洋史研究》，62 卷 4 號（2004），頁 1-31；郭洪敏，〈論熙寧變法與宋遼劃界〉（東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5），頁 1-32；陶晉生，〈宋遼邊界交涉的問題〉，《宋遼關係史研究》，頁 131-139；彭山杉，〈封陞之守——宋遼河東論熙寧劃界諸層面〉（復旦大學歷史碩士論文，2012），頁 1-74；蔣武雄，〈宋臣韓績與宋遼劃界交涉始末〉，《東吳歷史學報》，第 35 期（2016），頁 1-41。

邊吏言：『契丹泛使且至。』朝廷為之旰食，歷選可使敵者，羣臣皆憚行。宰相呂夷簡（979-1044）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弼，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為動容。壬申（二十九日），命（富）弼為接伴。弼以二月丙子（二日），發京師，至雄州。久之，（蕭）英等始入境……四月……庚辰（七日），以右正言知制誥富弼為回謝契丹國信使……七月……壬戌（二十一日），初，富弼、張茂實以結婚及增歲幣二事，往報契丹，惟所擇。弼等至穆丹河，劉六符館之……由是敵結婚之意緩，且諭弼歸。弼曰：『二論未決，安敢徒還，願留畢議。』國主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授之，宜遂以誓書來也。』……癸亥（二十二日），弼與茂實，再以二事往……九月……癸亥（二十三日），富弼、張茂實，以八月乙未（二十四日），至契丹清泉淀金瓊館，持國書二、誓書三，以語館伴耶律仁先、劉六符……是月乙巳（五日），弼等還至雄州。<sup>70</sup>

以及《遼史》〈興宗本紀〉，說：

重熙十一年（宋仁宗慶曆二年，1042）春正月……庚戌（五日），遣南院宣徽使蕭特末（蕭英）、翰林學士劉六符使宋，取晉陽及瓦橋以南十縣地，且問興師伐夏及沿邊疏濬水澤，增益兵戍之故……六月乙亥（四日），宋遣富弼、張茂實奉書來聘，以書答之……八月丙申（二十五日），宋復遣富弼、張茂實奉書來聘，乞增歲幣、銀絹，以書答之。<sup>71</sup>

從以上所引，可知富弼在這一年的交涉過程中，曾經兩次使遼，第一次往返是在夏季四、五、六月份，第二次往返則是在秋季七、八、九月份。

韓縝和沈括在宋遼河東劃界交涉事件的過程中，曾各有一次使遼。據《長編》卷二五〇，說：

宋神宗熙寧七年（遼道宗咸雍十年，1074）二月壬申（四日）……知瀛州天章閣待制韓縝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仍詔縝以瀛州事付河北東路都轉運使劉瑾，

<sup>70</sup>（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35，〈宋仁宗慶曆二年三月己巳條〉，頁15-16；（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35，〈宋仁宗慶曆二年四月庚辰條〉，頁19；（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37，〈宋仁宗慶曆二年七月壬戌條〉，頁6-15。

<sup>71</sup>（元）脫脫，《遼史》，卷19，本紀第19，〈興宗2〉，頁227。

亟乘驛赴闕。時契丹將遣泛使蕭禧來，召鎮館伴故也。<sup>72</sup>

這是韓鎮接觸宋遼河東劃界交涉事件的開始。當時遼國泛使蕭禧持國書至宋朝廷，提及宋國在邊地築城的爭端，也希望宋遼兩國共同派遣官員重新勘定河東地界。因此宋神宗派遣劉忱等人至河東與遼臣會勘地界，並且在三月甲子（二十七日），以「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韓鎮假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為回謝遼國使」，<sup>73</sup>出使遼國，告知宋國對於此事的處理態度和作法，但是韓鎮到達遼道宗夏捺鉢駐帳地——納葛濼後，並未得到遼道宗的召見，據《長編》卷二五二，說：

（韓）鎮至敵庭，不果致，但與押燕蕃相李相熙略伸酬對而還。<sup>74</sup>

《宋史》〈韓鎮傳〉，也說：

宋神宗熙寧七年（遼道宗咸雍十年，1074），遼使蕭禧來議代北地界，召鎮館客，遂報聘，令持圖牒致遼主，不克見而還。<sup>75</sup>

顯然韓鎮此次使遼，進行交涉事宜並不順利，但是我們已可知韓鎮此次使遼，往返的行程是在熙寧七年夏季四、五、六月份的時候。

至於沈括使遼，是在熙寧八年（遼道宗大康元年，1075），遼朝廷以去年會勘商量河東地界未獲得結果，遂又派遣蕭禧第二次使宋。但是蕭禧為了得到宋朝廷給予滿意的回應，竟然違反宋遼使節只能逗留於對方京城十天的慣例，辭而不行，逗留於宋汴京幾近一個月。<sup>76</sup>當時宋神宗因「蕭禧久留不肯還，故遣（沈）括詣敵廷面議」，在三月癸丑（二十一日），以「右正言知制誥制沈括假翰林院侍讀學士為回謝遼國使」，<sup>77</sup>據沈括《熙寧使虜圖抄》，說：

是時，契丹以永安山為庭，自塞至其庭，三十有三（六）日……以閏四月己酉（十八日）出塞，五月……癸未（二十三日）至單于庭，凡三十有六日。以六

<sup>72</sup>（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250，〈宋神宗熙寧七年二月壬申條〉，頁 4。

<sup>73</sup>（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251，〈宋神宗熙寧七年三月甲子條〉，頁 26。

<sup>74</sup>（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252，〈宋神宗熙寧七年四月甲子午條〉，頁 26。

<sup>75</sup>（元）脫脫，《宋史》，卷 315，列傳第 74，〈韓鎮〉，頁 10310。

<sup>76</sup>可參閱蔣武雄，〈宋遼使節逗留對方京城日數的探討〉，《空大人文學報》，第 12 期（2003），頁 197-212。

<sup>77</sup>（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261，〈宋神宗熙寧八年三月癸丑條〉，頁 7。



月乙未（五日）還，己未（二十九日）復至于塞下，凡二十五日。<sup>78</sup>

另外，沈括《入國別錄》，也說：

閏四月十九日離新城縣，五月二十三日至永安山遠亭子。<sup>79</sup>

雖然《遼史》〈道宗本紀〉在大康元年的記事，並未記載沈括使遼，但是我們已可知沈括使遼，往返的行程是在熙寧八年夏季四、五、六月份。

綜合以上所論，可知宋使節有可能因使遼任務的不同，尤其是因交涉事件使遼的泛使，更有可能在春、夏、秋季的月份使遼，而不同於正旦使、生辰使的使遼時間是在冬季的月份。

## 參、宋使節在不同時間季節使遼的影響

根據以上的論述，我們已知宋使節在不同時間季節使遼的原因，主要是因為遼承天太后生辰未改期受賀、遼帝后死亡與新君登位、宋帝死亡與新君登位，以及宋派遣泛使等四個原因，使宋朝廷所派的使節，有可能在春、夏、秋、冬四季的任何月份使遼，而不是和正旦使、生辰使使遼的時間一樣，比較固定在冬季的月份。但是如此一來，對於宋使節使遼的過程而言，將會產生一連串的影響。尤其是隨著遼朝皇帝在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捺鉢駐帳地的遷移，更會造成宋使節晉見遼皇帝的地點、使遼的行程路線，和在遼境時所見、所聞、所感都相對的受到影響，而有所不同。茲論述其影響如下：

### 一、造成宋使節晉見遼皇帝地點的不同

由於遼國皇帝每年四季都會隨著季節的變化，而移動其駐帳地，因此遼皇帝接見宋使節的地點並不固定，據《長編》卷七九，說：

<sup>78</sup>（宋）沈括，《熙寧使虜圖抄》（收入《永樂大典》，臺北：世界書局，1962），卷 10877，第 58 冊，頁 9-13。

<sup>79</sup>（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265，〈宋神宗熙寧八年六月己酉條〉，引沈括，《入國別錄》，頁 14。

（王）曾（977-1038）使遼還，言：「……初，奉使者止達幽州，後至中京，又至上京，或西涼淀、北安州、炭山、長泊。」<sup>80</sup>

這段話等於把遼皇帝接見宋使節的地點做一簡略的總結，說明了從宋遼兩國簽訂澶淵盟約之後，宋朝廷每年所派遣的使遼大臣，其晉見遼皇帝的地點，初期是在幽州，後來為了配合遼皇帝不固定的駐帳地，因此宋使節有至中京者，也有至上京、西涼淀、北安州、炭山、長泊等地。宋人晁載之在路振（957-1014）《乘軺錄》的跋語中，也說：

（遼皇帝）見宋使無常處，不皆在中京也。<sup>81</sup>

可見遼皇帝接見宋使節確實不會固定在同一個地點。因此每當宋使節使遼時，行至宋遼邊境，與前來迎接的遼國接伴使會合之後，才由遼國接伴使告知，必須前往某一地點晉見遼國皇帝。

關於這種情形，陳襄在其《神宗皇帝即位使遼語錄》中，提到實際的情況，說：

于五月十日到雄州白溝驛，治平四年十一日（遼）接伴使副泰州觀察使蕭好古、太常少卿楊規中差人傳語送到主名、國諱、官位及請相見。臣等即時過白溝橋……臣（孫）坦問受禮何處，規中言：「在神恩泊。」<sup>82</sup>

此段記載，不僅讓我們知道當時宋使節每一次使遼，其目的地究竟是在何處，包括宋朝廷和使遼大臣本人可能事先都不確定，也顯現出遼皇帝駐帳地的不固定性。其中原因據聶崇岐〈宋遼交聘考〉，說：「宋之帝后，少出都城，受禮之處，率在東京（汴京、開封）……若遼則不然，其俗好漁獵，帝后居處，年每數徙，故受禮之處不一，若燕京、若中京、若上京、長泊、若鞞淀、若炭山、若神恩泊、若雲中淀、若木葉山、若廣平淀、若西涼淀、若混同江、若北安州、若九十九泉，皆為宋使嘗

<sup>80</sup>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79，〈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十月己酉條〉，頁 3。

<sup>81</sup> （宋）晁載之，《續談助》（收入《叢書集成新編》（二）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卷 3，〈《乘軺錄》跋語〉，頁 49。

<sup>82</sup> （宋）陳襄，《神宗皇帝即位使遼語錄》（收入趙永春編，《奉使遼金行程錄》，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頁 59-60。此項引文，引自趙先生所編注之書，乃是因該書，說：「此《語錄》原附宋本《古靈集》之後，今傳《古靈集》本多無此文。金毓黻先生取日本靜嘉堂文庫所藏宋本《古靈集》本為底本，校補以庫中鈔本，以成完帙，收入《遼海叢書》，今即以《遼海叢書》本重加點校、注釋，並以金毓黻《使遼語錄·敘》列前。」顯然該書編注，足可做為依據。

至之地。」<sup>83</sup> 另外，據傅樂煥〈宋人使遼語錄行程考〉，也說：「契丹本是一個遊牧的民族……他們的君主雖則也有都城宮殿，卻絕不像中國君主，蟄居不出，而時時到各處去捕漁打獵。於是宋使見他的地方，也隨之漫無定所了。」<sup>84</sup> 這兩段話清楚地告訴我們，遼皇帝在四季捺鉢制度之下，其駐帳地的遷移和地點頗具變化，因此大部份的宋使節即使是在冬季使遼，其晉見遼皇帝的地點也有可能不相同，以致於宋使節如果在春、夏、秋季的月份使遼，則其晉見遼皇帝的地點就與冬季使遼更不相同。

筆者曾發表〈遼皇帝接見宋使節的地點〉一文，<sup>85</sup>述及有多位宋朝大臣擔任正旦使、生辰使，在冬季月份分別至下列地點晉見遼皇帝，例如至幽州晉見遼興宗的有程戡（990 或 997-1066）、張方平（1007-1091）、楊偉、方偕（992-1055）等人；至中京晉見遼聖宗的有宋搏、滕涉、陳知微（969-1018）、路振、李迪（971-1047）、乞伏矩、王曾（978-1038）、李士龍、呂夷簡、劉平等人；至上京晉見遼聖宗的有薛映（951-1024）、張士遜（964-1049）、李行簡、馮元（975-1037），以及至上京晉見遼道宗的有張宗益、蘇頌等人；至長泊晉見遼聖宗的有晁迥、查道（955-1018）等人；至瀋陽晉見遼興宗的有曾公亮（998-1078）、王洙（997-1057）、燕度、王珪（1019-1085），以及至瀋陽晉見遼道宗的有郭申錫（998-1074）、呂景初、王疇、吳中復（約 1011-1078）、閻詢等人；至木葉山晉見遼聖宗的有宋綬（991-1041）、德魯宗等人；至雲中甸晉見遼道宗的有范子奇（1035-1097）、賈昌衡、蔡確（1037-1093）、張熹、畢仲衍（1040-1082）、李清臣（1032-1102）等人；至廣平淀晉見遼道宗的有蘇頌（1020-1101）、彭汝礪（1042-1096）、趙偁、韓宗道、高遵惠（1042-1100）等人；至遼河晉見遼聖宗的有蔡齊（988-1039）、張保羅（雍）、孔道輔（987-1040）等人。

從以上所列舉，可知遼皇帝冬捺鉢的駐帳地有多處，因此當宋朝正旦使、生辰使在冬季月份使遼時，其晉見遼皇帝的地點並不一定相同。至於在春、夏、秋季月份使遼的宋使節，其晉見遼皇帝的地點，又會隨著遼皇帝春、夏、秋捺鉢駐帳地的一致，而與冬捺鉢駐帳地相異。關於這種情形，筆者特舉以下數例加以印證之：

<sup>83</sup> 聶崇岐，〈宋遼交聘考〉，頁 303。

<sup>84</sup> 傅樂煥，〈宋人使遼語錄行程考〉，《遼史叢考》，頁 21。

<sup>85</sup> 蔣武雄，〈遼皇帝接見宋使節的地點〉，《東吳歷史學報》，第 14 期（2005），頁 223-252。

### （一）穆丹河（沒打河）、清泉淀

據《長編》卷一三五、一三七，說：

宋仁宗慶曆二年（遼興宗重熙十一年，1042）四月……庚辰（七日），以右正言知制誥富弼為回謝契丹國信使，西上閣門使符惟忠副之……七月……壬戌（二十一日），初，富弼、張茂實（因符惟忠行至武強病死，以張茂實代替）以結婚及增歲幣二事，往報契丹，惟所擇。弼等至穆丹河，劉六符館之……及見國主（遼興宗）……翌日，國主召弼同獵……癸亥（二十二日），弼與茂實再以二事往……九月……癸亥（二十三日）……富弼、張茂實以八月乙未（二十四日）至契丹清泉淀金甌館，持國書二、誓書三，以語館伴耶律仁先、劉六符……翌日，引弼等見契丹國主。<sup>86</sup>

可見當時富弼以回謝國信使的身份至遼交涉增幣事宜，曾在該年兩度出使遼國，而且在時間上比較特殊，正是遼興宗進行秋捺鉢的時候，因此富弼先後在秋季的七月、九月至遼興宗秋捺鉢的駐帳地穆丹河、清泉淀，晉見遼興宗。

### （二）九十九泉

余靖（1000-1064）曾經三次使遼，在《長編》卷一五一提到其第二次使遼，說：

宋仁宗慶曆四年（遼興宗重熙十三年，1044）八月戊戌（九日），右正言集賢校理同起居注余靖，假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為回謝契丹使……九月……甲申（二十六日）……始，朝廷議封冊元昊，而契丹使來，即遣余靖報契丹，而留元昊封冊不發。余靖見契丹主於九十九泉，還奏……詔從靖言，仍令延州先移文夏人。<sup>87</sup>

另據《遼史》〈興宗本記〉，說：

<sup>86</sup>（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35，〈宋仁宗慶曆二年四月庚辰條〉，頁19；（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37，〈宋仁宗慶曆二年七月壬戌條〉，頁7；（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37，〈宋仁宗慶曆二年七月癸亥條〉，頁9；（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37，〈宋仁宗慶曆二年九月癸亥條〉，頁14。

<sup>87</sup>（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51，〈宋仁宗慶曆四年八月戊戌條〉，頁13；（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52，〈宋仁宗慶曆四年九月甲申條〉，頁7-9。

遼興宗重熙十三年（宋仁宗慶曆四年，1044）九月戊辰（十日），宋以親征夏國，遣余靖致驢禮。壬申（十四日），會大軍于九十九泉。<sup>88</sup>

因此可知余靖第二次使遼，是在秋季的八、九月份至遼興宗秋捺鉢駐帳地九十九泉，晉見遼興宗。

### （三）神恩泊

據《遼史》〈道宗本紀〉，說：

咸雍三年（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六月辛亥，宋以（神宗）即位，遣陳襄來報。<sup>89</sup>

另據陳襄（1017-1080）《古靈集》卷二五附錄《古靈先生年譜》，說：

治平四年（遼道宗咸雍三年，1067）丁未，公年五十一，神宗皇帝即位，公以諫議大夫使於遼，八月還，有《使遼錄》一卷。<sup>90</sup>

可見陳襄曾在宋英宗治平四年夏，以皇帝登寶位告北朝皇太后國信使的身份出使遼國。至於陳襄晉見遼皇帝的地點，據其所撰《神宗皇帝即位使遼語錄》，說：

臣襄等昨奉敕差充皇帝登寶位告北朝皇太后、皇帝國信使副，于五月十日，到雄州白溝驛，治平四年十一日，（遼）接伴使副泰州觀察使蕭好古、太常少卿楊規中差人傳語告送到主名、國諱、官位及請相見。臣等即時過白溝橋北，與接伴使副，立馬相對……臣（孫）坦問受禮何處？規中言：「在神恩泊，此去有三十程，已差下館伴副太常少卿楊益誠，大使即未聞。」<sup>91</sup>

因此可知陳襄該次出使遼國，是在夏季五、六月份至遼道宗夏捺鉢的駐帳地神恩泊，晉見遼道宗。

### （四）永安山

<sup>88</sup> （元）脫脫，《遼史》，卷19，本紀第19，〈興宗2〉，頁231。

<sup>89</sup> （元）脫脫，《遼史》，卷22，本紀第22，〈道宗2〉，頁266。

<sup>90</sup> （宋）陳襄，《古靈集》，（收錄於《四庫全書珍本》三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卷25，附錄《古靈先生年譜》，頁47。

<sup>91</sup> （宋）陳襄，《神宗皇帝即位使遼語錄》，《奉使遼金行程錄》，頁59-60。

永安山原名緬山，至遼聖宗時，始改稱為永安山，據《遼史》〈聖宗本紀〉，說：

太平三年（宋仁宗天聖元年，1023）七月丁亥（二十五日），賜緬山名曰永安。<sup>92</sup>

當時宋使節至遼永安山晉見遼皇帝者，例如有沈括等人。據《長編》卷二六一，說：

宋神宗熙寧八年（遼道宗大康元年，1075）三月癸丑（二十一日），右正言知制誥沈括假翰林院侍讀學士為回謝國使。<sup>93</sup>

而據沈括《熙寧使虜圖抄》，說：

是時，契丹以永安山為庭。自塞至其庭，三十有三（六）日……以閏四月己酉出塞，五月癸未至單于庭。凡三十有六日。以六月乙未還，己未復至于塞下，凡二十有五日……永安山，契丹之北部，東南拒（距）京師驛道三千二百十有五里，自慶州、上京皆有便道……永安地宜畜牧……北行稍東，三十里至新添帳。帳之東南有土山，庫池盤折，木植甚茂，所謂永安山也……頓程帳東南距新添帳六十里。帳西北又二十里至單于庭。<sup>94</sup>

從以上所述，可知沈括使遼，應是至永安山晉見遼道宗。尤其是當時沈括使遼，實際是為了與遼爭議河東疆界事，情況比較特殊，因此是在夏天前往，而據王易《燕北錄》，說：

夏捺鉢多于永安山住坐……所謂捺鉢者，戎主所至遊幸處也。<sup>95</sup>

依此更可印證沈括應是至永安山晉見遼道宗。

但是經筆者詳細閱讀相關史料，其實沈括抵達永安山時，才知道遼道宗已經臨時移動營帳至距離永安山八九十里的地方，因為據《長編》卷二六五，引沈括《入國別錄》，說：

閏四月十九日離新城縣。五月二十三日至永安山遠亭子，館伴使（蕭）琳雅、

<sup>92</sup>（元）脫脫，《遼史》，卷16，本紀第16，〈聖宗7〉，頁192。

<sup>93</sup>（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261，〈宋神宗熙寧八年三月癸丑條〉，頁7。

<sup>94</sup>（宋）沈括，《熙寧使虜圖抄》，收入《永樂大典》，卷10877，第58冊，頁9-13。

<sup>95</sup>（宋）王易，《燕北錄》，轉引自（清）厲鶚，《遼史拾遺》（收入楊家駱主編《遼史叢編》（三），臺北：鼎文書局，1973），卷13，頁247。

始平軍節度使耶律壽、副使、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梁穎二十五日入見。二十七日入帳前，赴燕。二十九日就館賜燕……臣括答云：「……至如近日北朝文字，稱今年在永安山受禮，今來館舍卻去永安山八九十里，不成，便須在永安山尖上受禮也。」<sup>96</sup>

可知沈括最後晉見遼道宗真正的地點，是距永安山遠亭子又有兩天行程約八九十里的遼道宗帳前，因此使沈括對於晉見地點移動的情況頗有怨言。<sup>97</sup> 但是無論如何，我們已可知沈括該次使遼，是在夏季閏四月、五月至遼道宗夏捺鉢的駐帳地永安山附近，晉見遼道宗。

#### （五）混同江

據《遼史》〈聖宗本紀〉，述及混同江名稱的由來，說：

太平四年（宋仁宗天聖二年，1024）二月己未（一日）朔，獵撻魯河。詔改鴨子河曰混同江，撻魯河曰長春河。<sup>98</sup>

而當時宋國使節至混同江晉見遼國皇帝者，有王拱辰（1012-1085）等人。例如據《長編》卷一七七，說：

宋仁宗至和元年（遼興宗重熙二十三年，1054）九月……辛巳（二十一日），三司使吏部侍郎王拱辰為回謝契丹使，德州刺史李洵副之。拱辰見契丹主於混同江，其國每歲春一漲，於水上置宴釣魚，惟貴族近臣得與，一歲盛禮在此。每得魚，必親酌勸拱辰，又親鼓琵琶侑之……壬午（二十二日），送契丹國馴象二。

<sup>99</sup>

另外，《遼史》〈興宗本紀〉，也說：

重熙二十四年（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春正月癸亥（五日），如混同江……辛

<sup>96</sup>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265，〈宋神宗熙寧八年六月己酉條〉，引沈括《入國別錄》，頁 14。

<sup>97</sup> 可參閱傅樂煥，〈廣平定考〉附〈夏捺鉢考〉，《遼史叢考》，頁 83-84；王民信，《沈括熙寧使虜圖抄箋証》（臺北：學海出版社，1976），頁 146-148。

<sup>98</sup> （元）脫脫，《遼史》，卷 16，本紀第 16，〈聖宗 7〉，頁 192。

<sup>99</sup>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177，〈宋仁宗至和元年九月辛巳條〉，頁 4。

已（二十三日），宋遣使來賀，饋馴象。<sup>100</sup>

由此二則記載，可知王拱辰是在宋仁宗至和二年九月下旬，由朝廷任命為回謝契丹使，並且在隔年春季一月至遼興宗春捺鉢駐帳地混同江，晉見遼興宗。

## 二、造成宋使節使遼行程路線的不同

從上文所論，可知宋使節因任務的不同，因此有可能在春、夏、秋、冬季的任何月份使遼，並且隨著遼皇帝春、夏、秋、冬捺鉢駐帳地的不同，使他們晉見遼皇帝的地點也不一定相同，而且連帶的也造成宋使節使遼行程路線不一定相同。據傅樂煥〈宋人使遼語錄行程考〉，說：「歷來以為遼主接見宋使是在三兩個固定的地點，並已曾有人試對於到達此數地點所經的路線，加以考證過了。然而事實上，其接見的地點是漫無定處的，我們現在所可考知的，便已有十幾處，則路線至少亦在十條以上。」<sup>101</sup> 可知當時宋使節使遼的路線，隨著他們在不同的時間季節使遼，以及遼皇帝四季捺鉢駐帳地的不同，而形成一個頗為複雜的問題。幸好傅樂煥在該文文末作有「宋臣使遼所經館驛名稱表」<sup>102</sup>和「宋臣使遼路線系統表」，<sup>103</sup>可以幫助我們對宋使節使遼的行程路線能很快地有一些了解，筆者在此僅引「宋臣使遼所經館驛名稱表」如下：

從白溝 到中京 (據王曾 上契丹 事)	從白溝 到北安 州(據 武經總 要)	從白溝 到清泉 淀(據 武經總 要)	從白溝 到炭山 (據武 經總 要)	從白溝 到長泊 (據武 經總 要)	從白溝 到木葉 山(據宋 綬上契 丹 事)	從白溝 到上京 (據薛 映記)	從白溝 到神恩 泊(據 陳襄語 錄)	從白溝 到東京 (據武 經總 要)
白溝	白溝	白溝	白溝	白溝	白溝	白溝	白溝	白溝
新城縣	新城縣	新城縣	新城縣	新城縣	新城縣	新城縣	新城縣	新城縣
涿州	涿州	涿州	涿州	涿州	涿州	涿州	涿州	涿州
良鄉縣	良鄉縣	良鄉縣	良鄉縣	良鄉縣	良鄉縣	良鄉縣	良鄉縣	良鄉縣

<sup>100</sup> (元)脫脫，《遼史》，卷 20，本紀第 20，〈興宗 3〉，頁 247。

<sup>101</sup> 傅樂煥，〈宋人使遼語錄行程考〉，頁 2。

<sup>102</sup> 傅樂煥，〈宋人使遼語錄行程考〉，頁 26-27。

<sup>103</sup> 傅樂煥，〈宋人使遼語錄行程考〉，頁 28。



幽州	幽州	幽州	幽州	幽州	幽州	幽州	幽州	幽州
孫侯館	孫侯館	清河館	清河館	孫侯館	孫侯館	孫侯館	孫侯館	孫侯館
順州	順州	？	雕巢館	順州	順州	順州	順州	順州
檀州	檀州	？	赤城口	檀州	檀州	檀州	檀州	檀州
金溝館	金溝館	清泉淀	望雲縣	金溝館	金溝館	金溝館	金溝館	金溝館
古北口館	古北口館		受賜州	古北口館	古北口館	古北口館	古北口館	古北口館
新館	新館		炭山	新館	新館	新館	新館	新館
臥如來館	臥如來館		疑有脫落	臥如來館	臥如來館	臥如來館	臥如來館	臥如來館
柳河館	柳河館		九十九泉	柳河館	柳河館	柳河館	柳河館	柳河館
打造部落館	北安州			打造部落館	打造部落館	打造部落館	打造部落館	打造部落館
牛山館				牛山館	牛山館	牛山館	牛山館	牛山館
鹿兒峽館				鹿兒峽館	鹿兒峽館	鹿兒峽館	鹿兒峽館	鹿兒峽館
鐵匠館				鐵匠館	鐵匠館	鐵匠館	鐵匠館	鐵匠館
富谷館				富谷館	富谷館	富谷館	富谷館	富谷館
通天館				通天館	通天館		長興館	
中京				中京	中京	中京	中京	中京
				榆林館	殺瀝河館	臨都館	臨都館	建安館
				饑烏館	榆林館	官窑館	鎬窑館	霸州
				香山子館	訥都烏館	松山館	松山館	牛心山館
				長泊	香山子館	崇信館	崇信館	宜州
					水泊館	廣甯館	廣甯館	遼州
					張司空館	姚家砦館	會星館	楊家砦

					木葉館	咸甯館	咸熙館	乾州
						保和館	黑崖館	唐葉館
						宣化館	三山館	獨山館
						長泰館	赤崖館	閭山館
						上京	柏石館	遼水管
							中路館	鶴柱館
							頓館	東京
							神恩泊	

【表三】宋臣使遼所經館驛名稱表

資料來源：傅樂煥，《遼史叢考》，頁 26-27。

另外，聶崇岐在〈宋遼交聘考〉，述及宋使節使遼的目的地和路線，也說：「宋使入遼，自白溝起，北行為新城縣，再北經涿州、良鄉縣、而至燕京。若往中京則自燕京東北行，經順州、檀州，出古北口（亦稱虎北口），歷新館、臥如來館、柳河館、打造部落館（簡稱打造館或部落館）、牛山館、鹿兒峽館（簡稱鹿兒館或鹿峽館）、鐵漿館、富谷館、通天館，遂至中京。若往上京，則自中京北行，歷臨都館、松山館、崇信館、廣寧館、姚家寨館、咸寧館、保和館、宣化館、長泰館、遂至上京。若往長泊，則自中京東北行，經殺瀝河館、榆林館、訥都鳥館（亦稱饑鳥館）、香山子館，遂至長泊。若往木葉山，則在香山子館與往長泊之道分，經水泊館、張司空館，遂至木葉館。若往神恩泊，則在廣寧館與往上京之道分，歷會星館、咸熙館、黑崖館、三山館、赤崖館、柏石館、中路館，而至神恩泊。若往炭山，則自燕京北行，經清河館，出居庸關，歷雕窠館、赤城口、望雲縣、遂至炭山。餘若往鞞淀等處之使路，則不得知矣。」<sup>104</sup>

雖然傅樂煥和聶崇岐兩人所言並未涵蓋當時宋使節晉見遼皇帝所有的地點與行程路線，但是我們將上表和聶文所言互相對照，已可知宋使節在不同的季節、月份使遼，由於遼皇帝四季捺鉢駐帳地的不同，因此也造成了宋使節使遼行程路線的不同。例如從傅樂煥「宋臣使遼所經館驛名稱表」中，顯示出王曾、宋綬、薛映等人為生辰使，是在冬季十月份啟程赴遼，而陳襄是告登位使，在夏季四月啟程赴遼，

<sup>104</sup> 聶崇岐，〈宋遼交聘考〉，頁 303-304。

彼此使遼的季節月份不同，目的地也不同，因此陳襄至神恩泊的行程路線，和薛映在過了廣寧館之後的行程路線即不相同。

### 三、造成宋使節對遼境所見、所聞、所感的不同

至於宋使節因任務和赴遼季節月份的不同，造成其使遼目的地和行程路線的不同，進而又造成他們往返於遼境所見、所聞、所感不同的情形，筆者在此先引幾位正旦使或生辰使在冬季使遼時所作的使遼詩其中一、兩首為例。例如韓琦（1008-1075）曾任正旦使至遼上京，作詩〈紫濛遇風〉，說：

草白崗長暮驛賒，朔風終日起平沙。寒鞭易促漳泥躍，冷袖難勝便面遮。迴嶺卷回雲族破，遠天吹入雁行斜。土囊微乞緘餘怒，留送歸程任擺花。<sup>105</sup>

王珪曾任正旦使至遼上京，作〈冀館春夕見月〉詩，說：

甚寵無如使牡行，曾同萬里聽邊秋聲。黃金臺下嘶宛馬，木葉山前度漢旌。纔到關南逢雁盡，重來海上見波平。故人臨月應相望，一夕寒光特為明。<sup>106</sup>

劉敞曾任生辰使至遼上京，撰〈陰山〉詩，說：

陰山天下險，鳥道上稜層。抱石千年樹，懸崖萬丈冰。愚歌愁倚劍，側步怯扶繩。更覺長安遠，朝光午未升。<sup>107</sup>

蘇頌曾先後兩次任生辰使，至遼廣平淀，撰〈奚山道中〉詩，說：

山路縈回極險屯，才經深澗又高原。順風衝激還吹面，灑水堅凝幾敗轅。山澗水流遇冰凍則橫溢道上，彼人謂之灑水，險滑百狀，每為車馬之患。巖下有時逢虎跡，馬前終日聽夷言。使行勞苦誠無憚，所喜殊方識漢恩。<sup>108</sup>

和〈契丹帳鹿兒館中見契丹車帳，全家宿泊坡坂〉詩，說：

<sup>105</sup>（宋）韓琦，《安陽集》，（收入《欽定四庫全書叢要》，臺北：世界書局，1988），卷4，〈紫濛遇風〉，頁10。

<sup>106</sup>（宋）王珪，《華陽集》（收入《四庫全書珍本第四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卷2，〈冀館春夕見月〉，頁1。

<sup>107</sup>（宋）劉敞，《公是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卷21，〈陰山〉，頁248。

<sup>108</sup>（宋）蘇頌，《前使遼詩》（收入《蘇魏公文集》（上），北京：中華書局，1998），卷13，〈奚山道中〉，頁163。

行營到處即為家，一卓穹廬數乘車。千里山川無土著，四時畋獵是生涯。酪漿羶肉誇希品，貂錦羊裘擅物華。種類益繁人自足，天教安逸在幽遐。<sup>109</sup>

蘇轍（1039-1112）曾任生辰使至遼上京，撰詩〈虜帳〉，說：

虜帳冬住沙陀中，索羊織葦稱行宮。從官星散依冢阜，氊廬窟室欺霜風。春梁煮雪安得飽，擊兔射鹿誇強雄。朝廷經略窮海宇，歲遺繒絮消頑凶。我來致命適寒苦，積雪向日堅不融。聯翩歲旦有來使，屈指已復過奚封。禮成即日卷廬帳，鉤魚射鵝滄海東。秋山既罷復來此，往返歲歲如旋蓬。彎弓射獵本天性，拱手朝會愁心胸。甘心五餌墮吾術，勢類畜馬游樊籠。祥符聖人會天意，至今燕趙常耕農。爾曹飲食自謂得，豈識圖霸先和戎。<sup>110</sup>

彭汝礪曾任生辰使，至遼廣平淀，撰〈大小沙陀〉詩二首，其一說：

大小沙陀深沒膝，車不留踪馬無跡。沙陀沙深處車馬過亦無跡。曲折多途胡亦惑，自上高岡認南北。大風吹沙成瓦礫，頭面瘡痕手皸坼。下帶長烟蔽深驛，層冰峨峨霜雪白，狼顧鳥行愁覆溺。沿河踏冰上，每日為常。一日不能行一驛，吾聞治生莫如嗇。<sup>111</sup>

以上是宋朝部分正旦使或生辰使在冬季月份使遼，面對遼境嚴寒的天氣、漫長的路程、艱險的路況，和異國的風光、民情、風俗，使他們在濃濃的鄉愁當中，將所見、所聞、所感抒發於使遼詩的詩句中。

但是反觀陳襄以告登位使身份，在夏季四月中旬從宋汴京啟程赴遼，至五月十一日進入遼境，因此其往返於遼境內的行程大半是在夏季的時候，也造成其對遼境的所見、所聞、所感，不同於冬季赴遼的正旦使或生辰使，例如其所作使遼詩〈黑崖道中作〉，說：

陰山窮漠外，六月苦行人。水迸金蓮曉，湯回鐵腳春。馬饑思漢草，僕病臥沙

<sup>109</sup> （宋）蘇頌，《後使遼詩》，收入《蘇魏公文集》（上），卷13，〈契丹帳〉，頁171。

<sup>110</sup> （宋）蘇轍，《樂城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卷16，〈虜帳〉，頁196。

<sup>111</sup> （宋）彭汝礪，〈大小沙陀〉二首，（收入傅璇琮主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卷903，頁10603。

塵。夜夢金華阻，披衣望北辰。<sup>112</sup>

以及〈使還咸熙館道中作〉，說：

土曠人稀使驛賒，山中殊不類中華。白沙有路鴛鴦泊，芳草無情妯娌花。毳館夜燈眠漢節，石梁秋吹動邊笳。歸來攬照看顏色，斗覺霜毛兩鬢加。<sup>113</sup>

顯然此二首使遼詩描述的是遼境夏季的風光景色，而且其感觸也有不同於正旦使、生辰使在冬季使遼時的感觸。另外，再根據陳襄《神宗皇帝登位使遼語錄》，說：

臣襄等……於五月十日治平四年到雄州白溝驛。十一日，接伴使副……蕭好古……楊規中……及請相見臣等即時過白溝橋北……十四日，行次遇雨。規中言，北界春夏已來，久愆雨澤，國信使副至新城縣及涿州，俱得甘雨，今日到燕京，若更霑足，煞是好也……六月一日，至中京。副留守大卿牛珣郊迎，置酒九琖。珣問塗中可煞炎暑。臣襄答以自過北溝，入古北口一路，得雨稍涼。珣言本京久旱，夜來得雨，蓋因國信使副所感也。<sup>114</sup>

此段記載使我們更加可以感受到陳襄在夏季五、六月行於遼境，其所見、所聞、所感與宋使節在冬季行於遼境顯然頗不相同，尤其是陳襄描述了在遼境夏日得雨的情形，而非冬日遭遇霜雪風寒的景象。

## 肆、結論

筆者近十幾年來研究宋遼兩國的交聘活動，深深覺得宋與遼訂定澶淵盟約之後，雙方能維持一百多年的和平外交關係，確實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雖然在這長期的和平外交關係當中，曾經有過增幣交涉和劃界交涉的兩次事件，但是在交涉期間，雙方還是如往年一樣，彼此互相派遣正旦使、生辰使祝賀對方的元旦和帝后

<sup>112</sup> (宋)陳襄，《古靈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珍本第三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23，〈黑崖道中作〉，頁7。

<sup>113</sup> (宋)陳襄，《古靈集》，卷24，〈使還咸熙館道中作〉，頁8。

<sup>114</sup> (宋)陳襄，《神宗皇帝即位使遼語錄》，《奉使遼金行程錄》，頁59-61。

的生日，顯現出兩國的外交友好情誼相當深厚，不會輕易改變。筆者認為這應是兩國君臣努力維護所獲得的結果，<sup>115</sup>而其中每年所進行的交聘活動，更是具有增進和維持雙方和平友好的作用。因此如就宋國而言，每年被派往遼國進行交聘活動的宋使節們，所扮演的角色即非常重要。

但是在當時的時空環境和人的體力有限的情況下，以宋使節而言，他們必須跋山涉水幾千里路，也必須忍受路險、天寒、鄉愁的折磨，因此其實宋使節每一次所進行的交聘活動，都是一次身與心的煎熬。<sup>116</sup>誠如歐陽修在其使遼詩〈書素屏〉，說：

君命固有嚴，羈旅誠苦辛。但苟一夕安，其餘非所云。<sup>117</sup>

以及〈答陸學士〉，說：

使北往返六千里，早衰多病，不勝其勞。<sup>118</sup>

可見歐陽修對於自己衰病在身，而必須使遼往返六千里，實在不勝其勞，但是在皇帝命令之下，身負重任，他仍然必須不辭辛勞前往遼國完成外交的使命。

這就正如本文所論述，宋使節必須配合不同的任務，不辭辛勞地在任何季節月份使遼。也就是當時宋朝廷所派的使節，除了正旦使、生辰使是比較固定在冬季的月份使遼之外，其他因為遼承天太后生辰未改期受賀、遼帝后死亡與新君登位、宋帝死亡與新君登位，以及宋派遣泛使等四個原因，造成宋使節均有可能在春、夏、秋、冬的任何季節、月份使遼，再加上遼皇帝春、夏、秋、冬捺鉢遷移駐帳地的原因，使宋使節在使遼時，晉見遼皇帝的地點、行程路線，和所見、所聞、所感都可能有所相異之處。

<sup>115</sup> 可參閱蔣武雄，〈論宋真宗對建立與維護宋遼和平外交的心意〉，《東吳歷史學報》，第15期（2006），頁91-116；蔣武雄，〈從墓誌論遼臣在遼宋外交的事蹟〉，《東吳歷史學報》，第27期（2012），頁1-41。

<sup>116</sup> 可參閱蔣武雄，〈從宋人使北詩論使遼旅程的艱辛〉，東吳大學歷史學系編，《史學與文獻》（三）（臺北：東吳大學歷史學系，2001），頁99-117。

<sup>117</sup> （宋）歐陽修，〈收入《歐陽文忠公文集》（一），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卷6，《居士集》，卷第6，古詩，〈書素屏〉，頁81。

<sup>118</sup> （宋）歐陽修，《歐陽文忠公文集》（二），卷151，《書簡》，卷第8，〈答陸學士〉，頁1225。

筆者認為，以上這些情形，等於很清楚地告訴我們，宋使節一旦確定承接出使遼國的使命之後，則其在春、夏、秋、冬任何季節的月份，都必須啟程赴遼、往返於遼境；還有不論遼國皇帝是在哪一季節捺鉢的駐帳地，他也都必須抵達；另外，不論行程路線有多麼漫長、艱險，他也都必須堅忍地往前行。因此本文對於宋使節在不同時間、季節使遼的原因與影響作比較深入的討論，不僅可以增加我們對於宋遼交聘活動，尤其是宋使節使遼過程的艱鉅與複雜性，有更深的瞭解，也讓我們體認當時宋使節為了維持宋遼和平外交關係所付出的心力，是值得我們予以肯定的。<sup>[圖]</sup>

## 徵引書目

### 一、史料

- (宋)王易，《燕北錄》，引自(清)厲鶚，《遼史拾遺》，收入楊家駱主編，《遼史彙編》(三)，臺北：鼎文書局，1973。
- (宋)王珪，《華陽集》，收入《四庫全書珍本第四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
-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宋)沈括，《熙寧使虜圖抄》，收入《永樂大典》，臺北：世界書局，1962。
- (宋)晁載之，《續談助》，收入《叢書集成新編》(二)，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
- (宋)陳襄，《古靈集》，收入《四庫全書珍本》三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附錄《古靈先生年譜》。
- (宋)陳襄，《古靈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珍本第三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宋)陳襄，《神宗皇帝即位使遼語錄》，收入趙永春編注，《奉使遼金行程錄》，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
- (宋)劉敞，《公是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
- (宋)歐陽修，《歐陽文忠公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 (宋)韓琦，《安陽集》，收入《欽定四庫全書薈要》，臺北：世界書局，1988。
- (宋)蘇頌，《蘇魏公文集》(上)，北京：中華書局，1998。
- (宋)蘇轍，《樂城集》，《四部叢刊初編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臺北：新興書局，1958。
- (元)脫脫，《遼史》，臺北：鼎文書局，1978。
- (元)脫脫，《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78。
-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97。
- 傅璇琮主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 二、專書

- 王民信，《沈括熙寧使虜圖抄箋証》，臺北：學海出版社，1976。
- 陶晉生，《宋遼關係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8。



陶晉生，《宋遼關係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

傅樂煥，《遼史叢考》，北京：中華書局，1994。

楊家駱主編，《遼史彙編》，臺北：鼎文書局，1973。

### 三、期刊論文

#### (一) 中文

朱小琴，〈宋遼關南地之爭〉，《西安教育學院學報》，第2期（2000），頁61-66。

李之勤，〈熙寧年間宋遼河東邊界交涉研究—王安石棄地數百里說質疑〉，《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期（1980），頁18-24。

李之勤，〈最早誣蔑王安石棄地的不是邵伯溫而是蘇轍〉，《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期（1980），頁63-69。

李裕民，〈宋太宗平北漢始末〉，《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期（1982），頁86-94。

黃鳳岐，〈遼宋交聘及其有關制度〉，《社會科學輯刊》，第2期（1985），頁96-97。

賈玉英，〈有關宋遼交聘中泛使概念的幾點辨析〉，《中國史研究》，第2期（2008），頁111-118。

彭鳳萍，〈淺析沈括使遼地界誤朝說〉，《益陽師專學報》，第22卷第1期（2001），頁60-62。

賀達、劉仁亮，〈富弼與慶曆增幣簡論〉，《河北師院學報》，第3期（1991），頁19-25。

鄭偉佳，〈試論“重熙增幣”〉，《河北北方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4卷第2期（2008）頁29-31、轉35。

蔣武雄，〈宋滅北漢之前與遼的交聘活動〉，《東吳歷史學報》，第11期（2004），頁1-27。

蔣武雄，〈遼代劉六符兄弟與遼宋外交〉，《中央大學人文學報》，第57期（2014），頁1-35。

蔣武雄，〈宋臣韓績與宋遼劃界交涉始末〉，《東吳歷史學報》，第35期（2016），頁1-41。

蔣武雄，〈宋遼使節逗留對方京城日數的探討〉，《空大人文學報》，第12期（2003），頁197-212。

蔣武雄，〈遼皇帝接見宋使節的地點〉，《東吳歷史學報》，第14期（2005），頁223-252。

蔣武雄，〈論宋真宗對建立與維護宋遼和平外交的心意〉，《東吳歷史學報》，第 15 期（2006），頁 91-116。

蔣武雄，〈從墓誌論遼臣在遼宋外交的事蹟〉，《東吳歷史學報》，第 27 期（2012），頁 1-41。

羅繼祖，〈關於“慶歷增幣”〉，《學習與探索》，第 6 期（1986），頁 126-127、轉 83。  
（二）日文

毛利英介，〈一〇七四から七六年におけキタイ（遼）、宋間の地界交渉發生の原因について—特にキタイ側の視點から〉，《東洋史研究》，62 卷 4 號（2004），頁 1-31。

#### 四、專書論文

王德毅，〈富弼使遼增幣交涉述評〉，張希清主編，《澶淵之盟新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頁 279-298。

王曉波，〈宋太祖時期宋遼關係的變化〉，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四川大學宋代研究所資料中心編，《宋代文化研究》，成都：巴蜀書社，1998，頁 222-237。

陶晉生，〈北宋慶曆改革前後的外交政策〉，收錄於氏著，《宋遼關係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頁 59-95。

陶晉生，〈宋遼邊界交涉的問題〉，收錄於氏著，《宋遼關係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131-139。

蔣武雄，〈從宋人使北詩論使遼旅程的艱辛〉，東吳大學歷史學系編，《史學與文獻》，臺北：東吳大學歷史學系，2001，頁 99-117。

藍克利，〈政治與地理論辯——1075 年的宋遼邊界談判〉，田餘慶編，《慶祝鄧廣銘教授九十華誕論文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頁 182-197。

聶崇岐，〈宋遼交聘考〉，收錄於氏著，《宋史叢考》（下），臺北：華世出版社，1986，頁 286-287。

#### 五、碩博士學位論文

郭洪敏，〈論熙寧變法與宋遼劃界〉，東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5。

彭山杉，〈封陞之守——宋遼河東論熙寧劃界諸層面〉，復旦大學歷史碩士論文，2012。

（責任編輯：余承勸）